

论城乡弱势群体问题的社会影响

黄霖

(西昌学院 经济管理系,四川 西昌 615013)

【摘要】城乡弱势群体应主要包括以下群体:城镇失业或下岗工人、城乡低收入者、孤寡老人和孩子、病弱无助者、残疾人、精神失常者等。无论是在物质生活上,还是在文化教育和社会政治地位上,他们都处于社会弱势境地。城乡弱势群体问题的长期存在不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增长,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不利于国家长期稳定。因此,应从拓宽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与地位的高度,关注和帮助弱势群体。

【关键词】城乡;弱势群体;特征;社会影响

【中图分类号】D6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4-0063-04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个新要求,并强调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回顾30年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相应的社会成就未能同步。一方面,中国经济起飞和“北京模式”举世瞩目;另一方面,影响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风险因素也日益凸显,社会弱势群体的现实存在及其负面影响,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

一 城乡弱势群体的基本特征

城乡弱势群体是指由于生理、自然或社会因素而缺乏基本的经济、政治或文化资源,自我生存与发展能力不足,在社会竞争中不能充分享受社会经济发展成果而处于不利境况的、需要社会给予特殊关爱和援助的人群集合体。现阶段城乡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城镇失业或下岗工人、城乡低收入者、孤寡老人和孩子、病弱无助者、残疾人、精神失常者等。城乡弱势群体贫乏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是其最突出的基本特征。无论是在物质经济生活上,还是在文化教育和社会政治地位上,弱势群体都处于不利境地。

(一)经济生活的趋贫困化

生活贫困是弱势群体的首要特征。弱势群体通常都是经济上的低收入者,其经济收入低于社会人均收入水平,甚至徘徊于贫困线边缘。弱势群体在财产、收入、消费、医疗保健等方面,普遍表现为收入低下、收不抵支、债务突出、高恩格尔系数、低消费和低营养标准。造成一部分社会成员在经济上的低收入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如:在市场竞争中失败,

下岗失业,身体残疾,年老退休,等等,都会造成经济上的低收入。

城镇弱势群体收入低、消费水平不高、营养不良的状况已相当普遍,他们用于食品方面的消费支出所占比重较大,恩格尔系数较城镇居民平均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城镇弱势群体多以失业或下岗人员为主体,失业或下岗现象是市场经济进程必然要经历的改革“阵痛”。但是在失业或下岗人员持续增加的同时,再就业的难度越来越大。近年来,随着失业或下岗人员的持续增加,由于失业或下岗职工年龄偏大、技能单一、文化水平不高、就业能力弱,再就业依然越来越困难。城镇弱势群体的住房条件也令人堪忧,医疗保障条件差,患病率往往要高于非贫困者,尤其是无力承受大病治疗支出。

乡村弱势群体往往居住条件恶劣,社会保障严重缺失,农村扶贫机制也不稳定。处于绝对贫困的农村人口常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房屋不能遮挡风雨。农民医疗费用支出逐年递增,有的年份还超过收入增长。许多需住院治疗的农民病人因经济困难未能住院,一些农户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农村地区没有从医学进步中得到太多好处。近年来,增加农民收入成为中国政府的首要政策之一,其中减免农业税力度最大,农民收益明显。但由于中国农民的境遇长期不佳,农村生产条件难以得到根本改善,农业抵御灾害能力差,农民依赖种田致富艰难,没有多少精英分子愿意务农,农村精英和青壮年劳力一般会选择进城谋生。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增多,但是难以城市化。进城务工农民已成为城市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力量,但在城市漂泊的农民始终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其生存环境比乡下也好不了多少。他们艰辛劳作却只能换来微薄收入,他们的生存、发展处于城乡游离状

态。实际上,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多数农民工的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闲暇时间少,从事的是城市人不肯干、不敢或不屑干的苦、脏、累、险、重的工种,其工作环境和居住条件的艰苦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二)社会地位的低影响力

社会政治生活的产品是公共政策,而公共政策是政府对整个社会的价值作权威性的分配。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徒具形式上的平等机会,在实质上却不具有平等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效果。在这一过程中,弱势群体因自身或社会的原因失语于资源配置的利益博弈中,往往以被排挤者的面孔出现。弱势群体相对远离社会权力中心,较少参与社会政治活动,难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弱势群体薄弱的经济基础也决定其社会地位相对低下和政治参与能力不足,以及表达呼声的机会缺乏。

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对居民家庭出身、政治身份划分造成强烈的冲击,社会转型期原有的社会阶层内部发生分化,原先享有较高政治地位的社会阶层,如产业工人的一部分人逐渐沦为弱势群体,他们的社会地位日显低微。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中被作为冗员裁减的下岗、失业群体和其它城镇弱势群体在收入、声望、教育等方面的差距拉大。工会作为工人群众组织,实际正处于一种尴尬位置,一方面,维护职工权益,就会不可避免地与企业领导“硬碰硬”交涉;另一方面,工会经费主要来源于企业,接受企业领导管制,“拿人家的钱,跟人家唱对台戏”几乎不可能。

中国农民阶层地位低微,更是由来已久。农民没有自己特定的代言组织,合法权益常常得不到有效保护,缺乏强有力的权益维护者和代言人,尽管过去存在农会系统。而且,在农村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碰撞中,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往往偏袒强势一方,牺牲弱势的底层人群。农民工利益受损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农民工成为城市最弱势的阶层,他们常常被剥夺应有的最基本的尊严和人格。虽然国家有明晰的法律规定:农民工平等享有法律赋予的基本人权,包括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虽然政府部门三令五申,要求依法严厉查处“黑心”老板的违法行为;虽然新闻媒体屡屡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但是许多农民工还是痛感“救助无门”。

(三)文化心理的高脆弱性

城乡弱势群体文化教育程度普遍低下,而且由于经济上的低收入性和社会生活中的贫困性、社会地位的低影响力,使得他们在社会中的心理压力高

于一般社会群体。一些农户子女受教育困难,特别是农村女孩的教育问题突出。在经济资源有限的农村地区,贫困家庭的女孩的教育机会与男孩存在着明显差异。许多女孩无法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为了保证家庭生存和弟兄上学,她们过早离开校园,有的四处奔波,成为城市流动大军的一部分。城乡弱势群体职业教育的社会支持也明显不足,他们的职业技能往往缺乏市场竞争力,或者已经失去年龄优势,因而没有职业安全感,“常有衣食之忧”,对生活前途悲观,造成社会心理压力不断增大。

同时,由于弱势群体在政治上的低影响力,也使得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改变目前的处境。尤其是农村原有的集体保障功能已经趋于瓦解,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脱离土地而从事其他产业,农村青壮年不断地涌入城市,许多农村地区只剩下老弱病残和未成年人,加上农户家庭日趋小型化,使得农村传统的家庭生活保障也在不断弱化。农村医疗基础薄弱,长期缺少资金投入和社会保障,许多农民的身心健康令人担忧,这些都造成了弱势群体在心理上的高度敏感性,使他们觉得自己是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或者感到自己被社会所抛弃。弱势群体存在比较严重的相对剥夺感和较为强烈的受挫情绪,在社会生活中缺乏社会支持感,而具有较低社会支持感的人对他人的评估比较消极,对社会和自身则产生焦虑及排拒感,在心理上容易产生不满、苦闷、焦虑、急躁情绪,难以自我调适。

二 城乡弱势群体问题的社会影响

(一)弱势群体问题影响全面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建设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更全面的、发展比较均衡的小康社会。因此,必须意识到,当前城镇失业人员还在增多,城乡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由利益冲突引发的大量社会矛盾依然相当突出,弱势群体问题可能恶性循环。对社会基层来说,无论是贫困的城市居民,还是陷入日常生活困惑的农村居民,一心盼望着的仍只不过是“有饭吃”。人类学家刘易斯的“贫困文化”理论表明,如果穷人被整个社会区隔在一定的区域范围之内,就会形成一种与主流文化脱节的贫困亚文化。贫困亚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体系、生活方式和代际相传的自我增强机制。由于城乡弱势群体缺乏知识、技能、资金、权力、能力和关系等资源优势,仅依靠自身的努力难以摆脱劣势地位。如果社会支持不足,个人受挫情绪就会愈加强烈,容易悲观失望,并且可能恶性循环。贫困恶化会导致教育缺失,教育缺失则强化贫困恶化趋势,

而且弱势群体不良思想与行为会相互影响、代际传递。不良家庭错误的言传身教和成年人失范行为,往往深深地诱导、误导未成年人。

市场规律总是倾向于优胜劣汰,产生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马太效应”导致强者越强,弱者越弱。改革的深入需要获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和普通支持,如果改革利益被少数人占有,而改革代价却由多数人承担,这就可能导致人们对“共同富裕”的怀疑。改革前期,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可直接从改革中获得好处,人们对改革具有极高的认同感。而今城乡弱势群体深受改革困扰,容易造成对经济改革的否定性评价。弱势群体的存在降低了民众对改革的认同感,也损伤着社会公平原则。人们会认为,现实存在的差距扩大与改革应使公众普遍受益的价值取向不相符。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由于社会不公平大量存在,普通民众的不满情绪会呈现从对收入差距不满向对分配过程不公平不满转移的趋势。人们会认为,中国分配过程不公平,分配秩序混乱,“富了不该富的,穷了不该穷的”。一些地方,企业主非法克扣、拖欠职工工资,使职工特别是农民工、临时工遭受职业病危害和工伤事故等,而且长期得不到有效整治。特别是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利益多元化,党员队伍也在不同地区、部门和行业出现利益分化。个别党员干部脱离最广大人民群众,当人民还没有普遍富裕起来的时候,他们争先恐后地先富起来;当贫困人口、贫困现象未根本消除的时候,他们却不择手段地侵吞扶贫资金和公共资产。对此,弱势群体深有感触。

(二)弱势群体问题影响经济资源

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可利用潜力大。但是,在现代生产条件下,中国劳动力素质整体低下,初级教育普及不够,大量弱势群体的存在造成巨大的充分就业压力,也日益成为人力资源开发的严重障碍。现阶段,中国失业率不断上升。由于失业人员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实际上等于零或接近于零,因此失业的实质就是人力资源的最大闲置和浪费。弱势群体的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文盲、半文盲极多,缺乏必要的现代劳动技能,因而,人力资源产出率较低,人力资本收益率也低于预期值,最终影响人力资本再投入,导致人力资源的恶性循环、代际传递。

弱势群体问题对生态资源产生巨大压力。农村地区是农民的生存基地,也是城镇市民的生态依托。为了生存,农民往往竭尽全力向有限的土地索取,从而加剧人与自然资源的紧张关系。由于长期

过分地向土地索取,而不重视土地保养,水利设施也年久失修,湖泊、洼地在缩减,青山、翠岭在消失,大量土地出现盐碱化、沙漠化、贫瘠化,水土流失,水源枯竭或污染,最终导致生态失衡。城镇发展也出现生态危机,“窝棚区”越来越多,可能演化成典型化“贫民窟”。尽管“窝棚区”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经验表明,无节制的“窝棚区”一旦超出有效控制的规模和程度,那么城市生态将严重失衡。中国应该借鉴国际经验,避免其它人口过亿的大型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盲目扩张导致的大量贫民窟、黑社会犯罪等造成现代化进程中辍的不稳定问题。

弱势群体问题势必影响国内消费需求,直接导致国内即期消费欲求萎缩,最终必然降低居民的消费倾向。由于诸如住房、教育、医疗等商品化消费措施出台,居民消费预期压力不断增大。一般家庭尚需精打细算,压缩即期消费以备不时之需,弱势群体更深刻地感受到沉重的预期消费的压力。城乡弱势群体是中国社会的基础阶层,他们的即期消费受压抑,导致社会内需的长期不足和“相对生产过剩”,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城乡弱势群体的大量和长期存在导致消费结构断层,造成社会消费畸形。“先富者”阶层的支付意愿通常高于消费行为,容易通过市场机制把有限的资源引向以满足高档需求为主的生产部门和服务部门,促使和加剧高消费现象。但是弱势群体则往往两手皆空、囊中羞涩,缺乏改善生活的基本经济动力。

(三)弱势群体问题影响公共安全

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在《最严重的警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一文中以大量数据警告说,中国经济繁荣背后隐藏着严重社会危机。城乡弱势群体长期承受着贫困的生存压力,看到某些丧失公平的不良社会现象,感受到利益损失与机会渺茫的危机,他们脆弱的心理承受力加剧着心中的恐慌和不安。当前,弱势群体大都属于相对贫困,而相对贫困与相对被剥夺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在相对贫困的基础上容易产生相对被剥夺感。这种心理状态的演变是复杂的,其后果更是严重的。

城乡弱势群体最具代表性的是城镇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下岗或失业工人、农村绝对贫困者。他们大多具有行业性、地域性,如下岗职工多来源于纺织、煤炭、森林等行业,多在内陆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村绝对贫困者大多集中于国家级贫困县和老少边穷地区。他们生活困难,文化素质较低,从众心理较强,他们人员集中,便于交流和感

染,容易形成强烈的内部认同感、归属感,具有自我整合性。城镇弱势群体对企业、国家和社会有着强烈的高预期和依赖感,由于他们生活在人口相对集中的政治、经济核心地区,其自我组织能力、集体意识和文化程度高于农民队伍,极易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大量进城农民处于城市边缘,往往自发结成团体或帮派,在维护自身利益时容易情绪化。

一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尤其是大量弱势群体的长期存在,会引起弱势一方对强势一方的敌视,甚至可能产生骚乱。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使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得到强化,使他们最先也最强烈地感受到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本与代价。于是,在弱势群体中就蕴藏了巨大的社会风险隐患,极易因“水桶效应”而成为社会动荡的“火药桶”。目前,中国居民基尼系数已接近和超过国际警戒线,属于收入差距过大的国家之一。城镇失业人员或流动人口的一部分属于影响社会稳定的高危人群之一,弱势群体的高犯罪率,失业与犯罪的高度相

关性,是犯罪学的老话题。随着改革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竞争、压力、矛盾、冲突、利益调整不断加剧,一些人心理承受不住了,一点点刺激就会引发他们选择极端,采取过激行动,导致越轨犯罪。近年来,犯罪率居高不下是和实际失业率过高分不开的,主要表现在刑事案件和群体性违法事件中,无业人员、下岗职工、进城民工占较大比例。

人民群众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主体,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受惠者。弱势群体的现实困境要求社会不断完善不同阶层的利益表达和保障功能。加快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胡锦涛强调,“我们一定牢牢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真心实意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必须紧紧依靠人民,认真落实改善民生的实践要求,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使我们的社会形成更加和谐、幸福、美好的生动局面。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周芳红,杜睿哲.论司法资源配置与司法公正[J].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7:98~100.
- [2] 赵光侠.强化执政党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中的作用[J].攀登,2007,5:47~49.
- [3] 李 梁.“免费”义务教育百年跋涉[N].南方周末,2005/11/24/A6.
- [4] 赵景峰.就业促进是解决转型时期弱势群体问题的关键[J].财政问题研究,2003,2:23~25.
- [5] 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最严重的警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J].战略与管理,2003,4.
- [6] 亨廷顿.政治发展[A].《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56.
- [7] 温铁军.中国的“城镇化”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教训[J].中国软科学,2007,7:23~29.

An Analysis of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the Vulnerable Groups i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HUANG Lin

(Economic Management Department,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13)

Abstract: Nowadays, the vulnerable groups in China's urban and rural areas mainly include the urban unemployed and laid-off workers, the low-income earners, the non-provided-for seniors, the non-cared sick people, the handicapped, the psychotics and disadvantaged in their material life, educa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tus. The large number of the vulnerable groups has negatively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of the society because it is not in the interest of the country's stability, economy growth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we should care about and help the vulnerable groups in order to widen and consolidate the ruling basis and status of CPC.

Key words: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Vulnerable Groups; Character; Social Influence

(责任编辑:李 进)